

第三章 人物形象分析

第一节 对“老一辈”华侨人物的形象分析

中国与泰国人民交往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两汉之际。华人大规模移居泰国是始于四百年前的明朝，郑和下西洋时曾留下部分随员定居泰国。到了清末民初，由于国内战乱频繁，大批华侨纷纷到泰国谋生，再加上十九世纪末随着拉玛五世朱拉隆功（1868-1910）改革的深入，泰国需要更多劳动力，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潮汕地区的人民为了谋生大量流入，掀起了一个移民潮。到一八九零年代，平均每年有十多万中国劳工进入泰国。早期寄居泰国的移民多是出外谋生的劳动人民，他们当中鲜有知识分子，大多数漂洋过海来到泰国谋生的华侨拥有的唯一财产就是一张草席、一个枕头，他们凭的就是中国人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精神和潮汕人特有的精明头脑，才在异国他乡生活了下来，这一代创业人在《三聘姑娘》中有着详细的描述，以“兴记头”为代表的一系列人物形象活生生地展现在作品中，可以说他们代表了第一代华侨在泰国的生活历程，他们中有的靠自己的努力发了家，建了业，却并没有得到子女的认同和尊敬，产生了对传统思想的疑惑和思考；有的身居异地，过着艰辛的生活，最终客死他乡，留下了对命运的思考；还有的梦想通过投机倒把的方式发大财，赚大钱，最后却走向了失败……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泰华社会老一辈华侨心路历程的缩影。

早期的华侨大多经历了一个艰苦的创业过程，书中列举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兴记号”老板——“兴记头”，刚到泰国时，他只是一个染绸工人，省吃俭用的他在“做后生人时，拼生拼死，一个丁凉水也不敢喝，俭生俭死，才开成了一家纱布铺”，有时候他心里也“真想干几顿酒楼”，但是“钱艰苦赚啊，终是花不出手”，他怨只怨“自己出世着个阿父无钱”。不管多么艰辛，多么困苦，幸运的是，他最终还是在三聘街立住了脚，并且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另一个是就是“老座山”，虽然他是“三聘街”一家生意更大更兴隆的商铺——“李合隆”的主人，虽然他的商铺现在在出入口、金行、洋行、银行等都有股份，是个显赫

的家族。但是十年前，他的商铺也只是一家只有一间铺面的洋杂店，当年他家的大儿子向“兴记头”的大姑娘求婚时，因为地位卑微，“险些吃了‘兴记头’的扫帚头”。他们都是辛苦创业的典型，作品中虽然没有详细介绍“兴记头”和“老座山”发迹的过程，但是从后面他们“守财奴”式的言行中我们可以猜想，他们一定是勤奋努力、俭而又俭，才积累了一定的财富的。作者之所以避重就轻，没有详细描述他们的发家史，目的就是想要探究这些所谓的老一辈“成功”华侨，在泰国社会立足之后，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思想历程，他们受到出生地国、居住地国以及当地华人社会的影响到底有多少？他们对待家庭、对待妻子、对待儿女的观念到底是怎样的？

笔者想就上述两个人物与《家》中的高老太爷做一个浅显的比较：巴金的《家》中，高老太爷是迂腐的卫道士和荒淫的纨绔子弟。他以卫道士自居，对子孙“教孝戒淫”，反对一切新事物；又偏以风雅自命，不但年轻时荒唐，而且在衰朽之年还玩小旦，娶姨太太。与之相对应的《三聘姑娘》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相似的人物形象，所不同的是，《家》着重记述了一个封建大家庭衰落的历史；《三聘姑娘》则以一个家庭为主线，通过三个女性的婚姻又牵连到了同在这条街上的华人家庭，故此，就出现了“兴记头”和“老座山”两个分担主次角色的“高老太爷”，这一处理使得整体形象更加饱满，更加具有代表性。但是，作者又抓住了“高老太爷”的地方特色和历史真实，即华侨早期到海外谋生及创业的经历，所以他们二人并不是像“高老太爷”那样，一出生就做了封建大家庭的“公子少爷”，而是像千千万万来泰国谋生的华侨一样，一出生就受到了生活的煎熬，故此，他们身上还没有纨绔子弟的荒唐。但是，他们毕竟是旧中国封建思想的承继者，在“五四”新文化思想还没有传播到中国东南沿海的时候，他们已经从潮汕地区，背井离乡来到了泰国，他们没有受到先进思想的洗礼，就进入到了泰国----这个已经被西方思想和文明侵入的国度。比起“高老太爷”，他们并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封建思想的卫道士，但是他们毕竟是“高老太爷”的后代，迂腐、守旧的封建思想一开始就被种植到了他们的脑袋里，所以一旦条件成熟，在他们取得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后，就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了。

封建思想中的父权、夫权、族权在这里得到了尽情的发挥，这一点与高老太爷在那个大家族中的威严可以相“媲美”。“兴记头”是“兴记号”这个“小王国”中的国王，他对大女儿宝珠和她的母亲颐气指使，尽情地“享受”着他的权威：宝珠的母亲是一个来自中国、安分守己的老式妇女，与丈夫白手起家，在泰国艰苦打拼，是“兴记头”的糟糠之妻，但是“兴记头”在发家后，不但没有感谢同甘共苦的妻子，而是娶了小妾，并且默许小妾挑衅、欺辱他的结发之妻，最后导致妻子抑郁、伤心而死。“兴记头”把妻子看作是自己的私人物品，看作是没有感情的物品，婚姻对他来说只是用来“传宗接代”的工具，在婚姻中拥有主导权的只有男人，男人才可以掌控婚姻和家庭，这就是封建社会夫权思想在“兴记号”淋漓尽致的表现。在妻子死后，他唯一能够发威的对象就转到了大女儿宝珠的身上，从两件事上就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不识字的“兴记头”感觉到他需要一个帮忙查账的心腹，于是就让宝珠去读书，宝珠于是就凛遵父命，孜孜不倦地用功读书；在15岁小学毕业的那年，宝珠又接到了父亲的“圣旨”，命令她退学，理由是女孩子15岁便是成人，不宜在外面抛头露面，宝珠于是就顺从地退了学。“兴记头”甚至不许女儿到门口去张望一下，不许女儿和下级的店员交谈，更不许女儿单身随便外出。这些行使所谓父权的行为比起高老太爷，有过之而无所不及。无独有偶，“老座山”的威严在他儿子大荣的婚礼风波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这个“卫道士”“秉承”着门当户对的传统思想，致使他的儿子大荣爱上了一个地位低下的女人，却了解父亲根本不可能接受这个女人，所以只能选择秘密结婚；而当大荣已经风流成性，准备要和“门当户对”的秀珠结婚却还和那个女人保持着婚姻关系的时候，“老座山”并没有对儿子的行径进行斥责，而是责怪秀珠和她的父亲看重他的财产，在婚礼的当天解除了这门婚事，扬言一定会为儿子找一个比秀珠好一万倍的女人。他这个李氏家族中的“封建君主”，可以任意控制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命运，致使他的下一代已经在这种桎梏中扭曲了灵魂。

荒淫，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思想的又一个具体表现。纳妾在封建社会中是男人地位的象征，嫖妓则是所谓风雅的表现。“兴记头”发家后，在纱布市

场中有了一席之地，在三聘街中建立了一个富裕的家庭，他认为天下全是他一个人打下来的，为了保住得之不易的地位，像当时侨社中很多有钱人一样，他也娶了妾，娶妾对他来说就是为了要显示他的一国之尊，显示他的身家和地位。就像他自己对女婿大荣说的那样：“有钱人三妻四妾原是常事，大荣有本领要娶多少位，我不敢反对，…”与高老太爷不同，“兴记头”娶妾不但是考虑到社会地位，他还有一个经济地位的考量，那就是要更好地经营他的“兴记号”。而出身商业家庭，精明、狡猾的小妾可以为他带来裙带关系、带来更多的财富，所以“兴记头”不顾结发之妻的哀怨，宠爱这个能够让他更加飞黄腾达的小妾，他这个“国王”的地位也就越加得到了巩固。作为作品的辅线，“老座山”的妻妾虽然没有被提及，但是作者巧妙地使用了秀珠和大荣两个人婚姻风波这个高潮点，让人物展示出了自身性格，即他视女性为没有感情的货品，是生意的一部分。

老一辈华侨人物的思想理念大多来自于腐朽的封建旧思想，他们反对新事物，遵循着一切他们认为正确的伦理道德。“兴记头”把二女儿和儿子送去洋文学校读书，并不是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思想，而是完全出于生意的考虑。本质上，他是否定西方文明的，他一直对二女儿的行为报着无可奈何的态度，对于他唯一的宝贝儿子绍基，他也是无能为力的。他可以在别人面前责骂儿子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却对儿子的行为听之任之，在钱财上听之放之，再加上因为西方物质文明的熏陶，华侨商业社会的买办性质的形势，儿子和二女儿成了他和洋人打交道的心腹助手，他这个做父亲的更是无话可说了，他的纵容最终导致了绍基因为强暴少女被关进了监狱，秀珠的婚姻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两件事的发生，使得“兴记头”受到了精神上的双重打击，然而，他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认清自身的错误和责任，所以，当大女儿宝珠来和他商量与黄勉----“兴记号”过去的心贤（潮州方言，指记账员）的婚事时，他震动万分，他不敢相信这个一向唯命是从的女儿会来和他商量事情，而且是终身大事，他感到世道真的变了。在他弄明白女儿真的要和他商量自己的婚事时，他第一时间就问黄勉现在在做什么事，当他得知黄勉只是一个机器技师时，他马上又愤怒地大拍桌子，说道：“我反对！他这种人不配做我的女婿”。虽然有了二女儿和儿子的惨败教训，“兴记头”还

是固守在他的旧眼光、旧思想中，与高老太爷一样，他还是不能接受新事物，他不能允许自己的女儿嫁给这种地位低下的男人，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下人”。他固执地认为，他是在保护宝珠，是对自己的女儿负责任，西方“文明”已经害了二女儿和儿子，他认为是行不通的，所以只有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传统道德和方法来行事，才是最妥当的。受到打击的他甚至破天荒地对着宝珠说出了很有人情味的话：“阿爸何尝不为你的婚事操心呢？阿爸也知道你是应该有一个婆家才对。……阿爸先慢一定替你找到一个好婆家！宝珠，听阿爸的话，你平素不是很听话的吗？”然而，“兴记头”毕竟不是高老太爷，在他的三女儿声情并茂的劝说下，他终于受到了感动，他觉得两个女儿的话“没有错”、“有充足的理由”，“他的心里信服了”，最后他竟然默许了宝珠的婚事，并且请黄勉派去的媒人喝茶、吃糖。他最终还是向新思想低了头，这也正说明了，相较于封建主义和制度在中国本土的根深蒂固，泰华社会中残存的封建思想和毒害，在西方思想和“五四”革命思想的冲击下，已经渐渐失去了根基，并逐步走向灭亡。

《三聘姑娘》之所以被称为泰华文学史上的一篇巨作，是因为它从某种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早期华侨华人在泰国生活的状况，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时代特色。作者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广阔、真实的生活场景，这中间当然有“兴记头”、“老座山”等所谓的泰华社会的“上层人物”，同时也有其他各层次的人物形象。基于主题思想的考虑，对于那些辛苦打拼却生活艰辛的下层人物，作者并没有用笔过多，甚至没有详细的描述，但是作者对他们的态度是肯定的，这一点从作者对其下一代子女的性格描述中就可略知一二：作品中唯一两个男性正面形象——张明翰和黄勉，都来自家境贫寒的家庭，其中在宝珠保留的“毕业同学录”中，作者特别提到张明翰的父亲是“一个小贩”，然而正是因为贫寒的家境，使得他们二人都奋发向上，最终做了对社会有用之人。可以看出，作者对他们都寄予了厚爱和期望。（笔者将在下一节对这两个人物进行较为具体的分析。）

在前面的章节中，笔者曾经提到泰华社会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并发生了与中国相异的社会变革。这一特定的社会形态反映在作品中，就形成了相应的人物形象，那就是那些被西方文明冲昏了头脑，一心想要富有，想要暴发的人物，然

而这些人所使用投机倒把的手段注定让他们走向失败。作者借用一个典型人物，真实地再现了特定时代下泰华社会部分人群的丑态。这个人物就是“兴记号”二太太之胞弟，被街市人尊称为“舅爷”的阿茂。作者使用了一个章节的篇幅专门向读者展示了这个人物形象，深刻挖掘了这类人思想变化过程：因为阿茂的胞姐就是“兴记头”的宠妾，他因此也做上了“兴记号”的廊主（潮州方言，意为老板委任的商行或厂家的主事人），狡诈、奸猾的他，凭着在商场上多年的人情关系，做起了投机生意，有时候还干一些走私的勾当，在朝鲜战争时，他囤积货物，没想到大战打不起来，货物大跌特跌，很难出手。他偷偷和别人合伙做了一批“乌土”（潮州方言，指毒品），也最终“破了水”（潮州方言，指事情败露）。作者特别提到，在投机生意上他和二姑娘秀珠搭线，秀珠为他牵线做了多桩交易。因为本人的资本有限，但是却急于暴富，又有着很大的野心，因此就开始走旁门邪道，利用他的特权偷偷挪用“兴记号”公款，商家买现款的货物他骗说是赊账，收了商号的现款他骗说是期票，想尽一切办法钻空子，但是却屡遭失败，最终侵吞了“兴记号”十二万铢现款后逃之夭夭，去了香港。通过这个人物形象，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当时的社会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一方面他为西方文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感到痛心，另一方面他通过自己手中的笔批判这一思想，意在唤醒民众认清社会状况，虽然身处异国，饱尝作为边缘人的异常艰辛，但是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永远是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

第二节 对“新一辈”华人子女人物的形象分析

在泰国出生的华侨华人的子女就是笔者所提到的“新一辈”人物，也可以称为“第二代”华人。他们虽然身为炎黄子孙，但是由于大至社会背景、教育背景，小至成长背景、家庭背景的不同，使得他们如同散播到各地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壤和环境中成长，构成了不同人格、不同思想的人物类型。笔者试着把这些人物分类，并对其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比较。《三聘姑娘》是以三个女性的命运作

为文章的主线，笔者将在下一节对这三个女性人物进行详细的分析，本节只就作者在作品中提及的四位主要男性人物----“李合隆”的“三舍”（潮州方言，意指少爷、公子）李大荣；“兴记头”的儿子绍基；“兴记号”的旧心贤（潮州方言，意指记账员）黄勉；新心贤张明翰作一些分析研究。

“新一辈”华人子女的生长环境是相对宽松的，泰国政府对华侨第二代采取宽容的政策，使他们从出生起就成为了合法的泰国公民，然而同时政府也不断地关闭中文学校，强迫他们学习泰文，这一点作品中也多次提及：“兴记头”的二女儿和儿子刚读了一段时间的中文书，“学校就被封了”；张明翰也曾经告诉宝珠在她“离开学校后不到一年，学校就都停闭完了”，故此他们被强制性地融入了泰国社会，他们没有父辈们对生活和前途的忧虑，再加上父辈们的艰苦打拼，到了第二代，他们有了一定的心里归属感和对所在国的认同意识。然而，作为一个生活在泰国的特殊群体，还是有异于泰国本地人的，一方面他们受到了中国传统家庭的影响，从小就接受了中国伦理道德的标准；另一方面，因为与泰国人的接触、融合，使得他们更深入地了解了泰国传统社会，同时，西方文明对泰国社会乃至华人社会的影响也直接影响了他们。在这种错综复杂的身份认同上，使得一些人在封建旧思想和西方文明的双重影响下，扭曲了心灵；而另一些人，虽然身处困境，却始终对社会对自身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积极向上，努力奋进着。

绍基和李大荣都是三聘街的纨绔子弟，受家庭和泰华小社会的影响，他们身上既有着《家》中克安和克定的荒淫，又因为三聘街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受过“洋教育”的缘故，使他们染上了崇拜金钱和享受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思想。作者对这两个人物的刻画生动鲜明，特别是李大荣这个角色，因为他与另外一个女主人公秀珠存在着恋爱和准婚姻关系，故此，作者力图通过他和秀珠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了人物内心复杂的世界。对李大荣的描写集中在两个高潮，一个是华裔商业巨商举办的游园会上，李大荣首先以“开着一辆一九五五的新款‘标域’，穿着夜礼服，打扮得很入时，长得很高大，很有一个外国青年的绅士派头”而出场，进而作者写出了一段大荣和秀珠的对话：

“你知道吗？十年前，我大哥也曾经托媒向你大姐求过婚。”

“结果怎么样？”

“结果去说亲的媒人，险些吃了你父亲的扫帚头！——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二姑娘摇了摇头。

“因为那时候，李合隆不过是在越三振一家只有一间铺面的洋杂店。现在呢？出入口、金行、洋行、银行都有李合隆的份了！”大荣说到这里突然哈哈大笑，笑得很出奇，是得意还是讽刺，令人捉摸不清，然而二姑娘却也陪着大声地笑了起来。

笑罢，大荣又说道：

“现在呢，我的大哥已经绿叶成荫子满枝了，你们的大姑娘呢，依然是小姑独处犹无郎。——现在她该有三十岁了吧？”

二姑娘又点了一下头。

大荣又好像引起回忆地说：

“那时候，大姑娘的名声呀，红的发紫！生得漂亮，知书识字，会打算盘，又会记账，这样的女人三聘街那时候能找得几个？——可是现在呢，唉！青春不再！人老珠黄啰！”说到最后，他摇头慨叹了一声，又把手一摊，表示了没说出来的话：“一生什么都完了！”

二姑娘听了沉默着。

“平心说一句，你父亲不好，要求这，要求那……这哪！好比货物一样，抬太高价了，一定难出手，结果呢，失去了时机，不放在货仓里发霉才怪！”

通过上述谈话，我们不难看出李大荣金钱至上的思想，女人对他来说也只是一种货物，是可以待价而沽的。然而他的这些思想正是来自于“生活”，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实例，才教会了李大荣正视现实，才让他明白了没有钱就没有地位，没有地位就不可能在社会中出人头地。他认为“兴记头”对自己女儿的做法

是不好的，理由就是没有瞅准时机把女儿卖个好价钱！正是因为他在三聘街的耳濡目染，才使得他产生了这些荒谬的想法，使得他凭借自己家世的显赫，随意玩弄女性。在游园会上，未婚妻秀珠在场的情况下，还去追逐一个有名的交际花，并引来了一大群摩登的娘儿们，与她们打情骂俏，闹成了一片。

“自由”与“平等”是资产阶级革命所追求的目标，是针对封建制度提出的一个进步要求，其实质是要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对《家》和《三聘姑娘》中的城市青年来说，恋爱和婚姻的自由似乎是他们最急于追求、最关乎他们生活的一个理想。但是，对恋爱“自由”的曲解也是作者担忧和批判的一个话题，这一点在描写大荣这个形象的另一个段落中形成一个高潮，那就是他和秀珠的婚变：秀珠在结婚前一天知道了大荣已经秘密地与一个女人结了婚，并且还有正式的婚姻登记证。因此，在结婚的当天上午，秀珠约大荣出来，质问他昨晚为什么彻夜不归，大荣狡辩说：“我的女朋友会多了一点，但这也不过是交际场上平常免不了的应酬，...这正像你有很多男朋友，我并不以为奇一样”，“我们彼此应该互相尊重各人的自由，只要我们彼此都忠实爱情，信任爱情，什么误会都无从发生”。大荣所谓的“自由”和“爱情”就是对女性的一种玩弄，对感情的不负责任。他并没有真正懂得什么才是爱情，因为他不懂得尊重女性，他用一顶冠冕堂皇的帽子，来掩饰其“荒淫”的本质。然而，李大荣并不是高老太爷的子孙，他毕竟生活在充斥着资产阶级物质文明的三聘街，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接受了“平等”这个概念，因为他可以接受未婚妻“有很多男朋友”，而且他强调彼此要“互相”尊重。就这一点来看，大荣似乎已经比克定和克安“进步”了许多，然而这也正说明了泰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从一开始就具有不彻底性，可以说它是站在封建旧思想的立场对资产阶级新思想的一种自我阐释。因为大荣所谓的“恋爱、婚姻自由”是离不开三聘街中“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离不开其父“老座山”的封建家长制作风的。李大荣喜欢一个没有地位的女人，但是却怕父亲反对，所以才秘密结婚。当“兴记头”请来办理结婚登记的县署工作人员，逼迫大荣当场签结婚证书时，大荣的心里只考虑到“这些事如果让父亲知道了，一查究起来，所有的烂污准会一下子都拆出来的，不知道父亲会怎

样严厉地斥责与处罚他”。由此看出，某种意义上，尽享荣华富贵的大荣还是一个封建制度的牺牲品。

“兴记头”唯一的宝贝儿子绍基是个连大荣也“赞叹”的人物，在“兴记头”嘴里，他是一个“一天到晚在外面花天酒地乱用钱的不孝子”，回家一趟就会把家里的佣人阿香顺便拧一下的浪荡公子。比起大荣，他更年轻、更“时髦”，他会搂着舞女，跳让秀珠喝彩的南美洲疯狂舞曲，开着吉普车到处乱逛，最终因强奸罪被关进了监狱。作品中描写他的文字不多，然而只言片语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比大荣更堕落、更荒淫的“新式”人物，他虽然已经从表面上脱离了父亲的管束，但是因为是家中独子，从小受到父母的溺爱以及在洋人学校接受教育的背景使得他早就被种下了悲剧的种子，并最终走向了灭亡。

作为正面人物形象，作品中还有两个积极上进的青年——张明翰和黄勉。与大荣这个人物相比，这两个人的形象显得并不饱满，甚至有些典型化的倾向。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对人物外貌的描写上，人物性格和思想更显得有些单薄。作者这样描述刚到“兴记号”账房工作的张明翰：“他是一个年纪约摸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生得颇英俊，尤其是在两道剑眉下的那一双眼睛，在沉着中时刻闪烁着一种智慧的光芒”，从一开始作者就难以掩饰地把自己的热情和希望赋予了这个人。而作为辅助性角色的黄勉，作者同样寄予了喜爱之情“他圆圆的面庞，满溢着精神焕发的光采；他结实的体魄，发挥着一股健康的活力”。这两个人物都来自于贫寒的家庭，但是出身的低微并不能阻止他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张明翰和黄勉先后都做过“兴记号”的心贤（潮州方言，意指记账员），这种职业在当时被看作是一种低贱的职业，不但泰国政府不予承认，而且华人社会也不予尊重，“木盛头”就曾经取笑亲自记账的“舅爷”阿茂：“大大兴记号，无雇心贤，大大廊主要来包心贤？说出去谁肯相信？笑死街市人了”。但是从始至终，不管生活多么艰辛，张黄二人从没有心生怨气。张明翰不但自己努力工作，而且还在思想上不断帮助宝珠和珮珠进步。而黄勉也不计较宝珠曾经因为软弱而离开了他，五年来还一直坚守着这段感情。作者似乎想把所有优秀的品格都赋予他们，想要使他们成为当代青年的一个偶像，但是这些思

想和行为的根基是来自于哪里呢？虽然作品中提及他们都接触到了《家》这部作品，深知封建思想的危害。但是在到处都充斥着西方物质文明的泰华社会，在人人都以与洋人接触为荣的三聘街，到底是什么样的思想动机才使得张黄二人自得其乐，做了“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呢？对这方面的剖析，似乎显得不够丰满。诚然，这两个人物是作者对美好未来的一种憧憬，但是因为脱离了现实这个基础，所以人物形象和作者的理想都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并没有从根本上给迷茫中的青年指明一条人生和生活的道路。

第三节 书中主要人物的形象对比

巴金的《家》以封建大家庭中的三个青年——觉新、觉民、觉慧，作为主要人物来表现反封建的主题，而陈行的《三聘姑娘》则以泰国三聘街华人家庭中的三个姑娘——宝珠、秀珠、珮珠为主要人物来表现同样的主题，并且在《三聘姑娘》中作者反复提到了《家》这部作品，甚至以觉慧、琴等形象作为其主人公思想和行为的典范。这其中是否有内在的关联？而陈行是否在写作过程中精心安排了这种雷同呢？在这一节中笔者想就以上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就觉新这个人物，专家学者们已经作出了很多相关的研究，其中陈思和所著之《巴金研究的回顾与瞻望》（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中就提到“觉新性格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与没落趋势看得很明白，但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势力使他无力反抗这种压力，他屈服，苟安，明知是封建专制的罪恶行径，却但不得不含着眼泪，违心去服从，以求换取个人生活的片刻安宁”。这也正是宝珠的主要性格，她逆来顺受，完全顺从父亲的意志，不敢有半点的违背。对于这个人物，与巴金一样，陈行对她也是抱着同情态度的，但是作为女性，宝珠对封建制度的罪恶和没落并没有看得很明白，她所哀怨的只是“二妈”对母亲的欺辱，是对自己命运的担忧，她心里可能清楚是自己的父亲造成了家庭悲剧的发生；是三聘街各个家庭中父兄的阻挠才使得多位姐妹失去了自己的幸福，但是因为从小的逆来顺受，她连怪罪他们的想法都不敢有，更不要说

反抗。她的“苟安”并不是害怕失去她所依附的生活环境，她只是习惯了顺从，她不知道除了顺从，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觉新害怕革命，害怕失去他在大家庭中的地位；宝珠害怕的则是失去带给她悲剧命运的父亲，因为这是她在这个家庭里唯一的亲人，是她的依靠。这其实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女性的两面性：一方面痛恨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而感情上还留恋就家庭，所以妥协屈从是他们唯一的道路。

陈汀是不同意青年走这条道路的，就像巴金也反对觉新走这条路一样。但是从《家》到《秋》，觉新的反抗是经历了“由秘密到公开，由间接到直接这样一个逐渐发展变化的过程”（《巴金研究的回顾与瞻望》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他的反抗源自于对受封建思想压迫的兄弟姐妹的同情，同时又想要顺从封建长辈，所以他是矛盾的，他是从矛盾中走向成熟的；宝珠的反抗则更多的是一种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她的这种觉醒是通过其他人物的影响来完成的，因为她本身就是受封建思想迫害最深的受害者，又认识不到施害者的真实面目，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她是被珮珠和张明翰拉出思想观念和社会交往的狭隘区域，走出小圈子，步入到社会这个大熔炉里来的。她慢慢地才了解：作为一个女人，她的命运不应该是被别人掌控的，自己的幸福可以自己争取。虽然最后她在跟父亲争取与黄勉的婚姻时，还显得那么羸弱，几乎又要妥协，但是毕竟她的内心已经觉醒了，她已经迈出了反抗的第一步。作者想要寄语那些被传统旧思想束缚的泰华青年，特别是那些受压迫的女青年：腐朽的封建思想已经步入灭亡，那些曾经或者正在绝望中挣扎的女性应该与男性一样，为自己的命运和幸福抗争。

《家》和《三聘姑娘》的两位作者都在批判封建制度和思想的同时，歌颂了民主主义思想，而他们对民主、自由的向往都寄托于作品中某一个人物形象上，通过人物性格和思想表达了他们对旧制度的憎恶和反抗，同时也将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寄情于人物的命运之中，试图为社会为民众寻求到一条光明之路。因为叙事角度的差异，两位作者在人物性别的选择上也有着不同的考虑：中国在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知识分子认识到个性自由的重要，同时他们又感到“时代一下子把他们抛出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思想轨道，把他们抛到思想的旷野

上，孤独一人，无依无靠，使他们本能地为这种独立思想和独立生活所付出的代价感到沮丧”（《巴金研究的回顾与瞻望》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166页），所以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普遍有着彷徨痛苦的心理，他们是在苦难中努力寻找自身的解脱之路。巴金作为一个“五四”青年，也是与时代同患难共呼吸的，他个人的经历就是一种寻求探索的过程，他把自己离家出外求学，对封建大家族、对大哥、对爷爷的感情等经历一股脑地放在了觉慧这个人物中来完成，让觉慧重新展现巴金的心路历程，可以说，觉慧就是巴金生活的积累和释放，故此这个人物充满了生活的情感和感染力，也是那个时代的象征；而作为一个生活在泰国社会的边缘群体---泰华社会中的一个知识分子，陈竹的思想更多的是受到“五四”以来中国民主思想的影响，那时候泰华知识界还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集体，再加上泰国政府排华亲美的政策，使得知识分子处于一种思想迷茫的时期。作为一个洁身自爱的华侨，陈竹渴望堂堂正正地做人，但是社会的黑暗使得他似乎看不到希望，不知如何反抗那个邪恶的社会，故此，他把一腔热血汇入到作品之中，借此抒发自己的感情。但是由于泰国社会受西方文明影响之故，其社会形态与中国差别较大。在当时的泰华社会中，不但残存着封建腐朽思想，而且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思想也在青年中广泛流传。陈竹在批判这两种思想的同时，将自己对个性自由的理解赋予到珮珠这个人物里，让当时的读者对社会、对自由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珮珠在生活中的原型就是那个提供日记给陈竹的“一个朋友的妹妹”，一个“天真活泼的十八岁少女”（《三聘姑娘》序，大地出版社）。珮珠是作者眼中“幸福的四姑娘”，她是新时代的女性，年轻、热情、勇敢，她与大姐宝珠虽然是同父异母，但是依然同情懦弱的大姐，她认为大姐“太灰心，消极，悲观了！这种做人的态度完全是错误的！她受了家庭许多压迫，但是她一点也不敢反抗！她就像漂在水面的那些空纸壳，任由命运摆布”。即使大姐误解自己的好意也不气馁，主动帮助大姐争取自由；她的思想意识也是属于新时代的，她不喜欢别人叫她“四姑娘”，因为“姑娘”这个词就代表了一种阶级观念；她喜欢觉慧和琴，因为她认为自己和琴同是女性，琴就是女性的好榜样”；她对恋爱和婚姻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于爱虚荣的二姐，她这样评价：她们

名目是自由恋爱，其实完全是一宗变相的买卖婚姻。从这些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思想，作者是想通过珮珠之口，让自己的爱憎得到完整的表达。然而，对于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即使是生长在新时代的少女，她的思想年龄都显得过于成熟，试想生活在一个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家庭中，并且在西方文明侵入泰华社会的大环境下，珮珠只读了一本《家》，就会对周遭的一切都可以作出正确的评价和分析吗？她的思想根基又是来自哪里呢？显然在这一点上作者并没有给读者一个明确的答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从珮珠身上感受到作者对未来、对青年的美好希望和鼓舞，这一点也是与觉慧对读者的激励作用是相同的。

秀珠和觉民都可以算作是新时代的青年：秀珠读的是“洋文学校”，觉民也是一个“英文说得自然、流利”的学生，然而两位作者在他们作品中对这两个人物却有着不同的性格安排。相对于觉新和觉慧，觉民这个人物的性格塑造并不典型，他有着与觉慧相似的反抗精神，但是因为作者给他安排了一个比较顺利的遭遇，使他胜利地得到爱情，跨过了逃婚的斗争，故此他的反叛没有觉慧表现得那样强烈，他与觉慧之间的差别不大，所以并不能理解为觉新、觉慧之外的第三个典型人物形象，只是巴金对觉慧这类人物的一种补充描写；秀珠却可以理解为有别于宝珠和珮珠的第三种人物，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泰华社会的特殊形态，即西方文明对青年在社会和文化心理方面的侵染，就是通过秀珠这个人物来表现的，而秀珠作为女性又有着特殊的说服力。

作者在《三聘姑娘》的序中明确表明他描写的是“封建残余制度压迫下婚姻不自由的事”，但是他对侵入泰国的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又是持何种态度呢？通过前面章节对李大荣和绍基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而本节所要涉及的秀珠这个人物，作者则运用了更多的笔墨，秀珠是受西方教育影响的女青年中的典型人物，内心里鄙视那些像大姐一样不懂得追求自由的女人，从外貌到内心她都极力想要做十足的“洋女人”，她喜欢被别人称为“红毛姑娘”，认为这就是她最大的骄傲。外貌上，为了表明自己的开放和进步，有别于那些保守的受封建制度约束的女青年，她把自己打扮得像一只开屏的孔雀，穿胸部袒露得不能再袒露了的衣裙，留一头电得蓬卷的短头发，涂鲜红的口红，喷外国的香

水；行为上，为了表明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表明女人和男人享有平等的权力，她可以对未婚夫大荣乱搞女人而视而不见，并且以“男人对女人就像蚂蚁见了糖一定要吃的道理”来解释男人对爱情不忠实的原因。而她自己也成为泰华社会的交际花，周旋于那些像苍蝇一样围在她身边的男人中间，耍弄手段玩弄他们，享受着男人作为她的玩物的感觉；生意场上，自诩聪明伶俐，神通广大的她，利用自己“广泛”的交际，帮助父亲、舅舅，也帮助自己寻找发财赚钱的机会。作者把一个出生在封建家庭，而受到西方教育影响女青年的心态展现在读者的眼前：由于从小家庭和社会环境对她的耳濡目染，她认识到大姐宝珠等一些女性悲惨的命运，极力想要摆脱这种封建思想的束缚，而西方教育和思想似乎让她看到了一条属于女性的新路，她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是新时代的女性了：她可以像西方女性那样暴露自己的身体，殊不知只是为了迎合男人贪婪的欲望：她可以耍手段玩弄男人，殊不知自己已经成了他们的玩物：她以为自己是自由恋爱的婚姻，殊不知却是买卖婚姻的牺牲品：她以为大荣不会像抛弃别人那样抛弃她，因为她有一纸婚书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殊不知在婚礼的当天就被大荣和他的家庭所抛弃...她的美梦最后终于清醒了，她一个人悄悄地到医院堕了胎，这时的她才明白她所追求的金钱、地位和享受都是那么地虚伪，她所幻想的都完完全全地破灭了。作者是要通过秀珠的遭遇告诉人们，社会的风气日况愈下，作为青年应该自重自爱，不要在堕落的漩涡中不能自拔。